

# 东北易帜原因初探

朱汉国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统率东北三省各军政要人通电全国，表示愿改悬国民党旗，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南京政府。这一事件，史称“东北易帜”。

关于东北易帜的原因，在一般论著中，大多略而不叙，或则语焉不详。笔者从手头大量的材料中发现，在东北易帜的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因素。究其东北易帜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列种种。

## （一）国民党北伐军重兵压境

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联合新军阀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一月间，北伐军势逼华北，张作霖迫于战争形势，五月八日通电求和，六月二日发表出关通电，奉军旋即连夜出关。北伐军紧追不放，两军相峙于滦河两岸。北伐军中以冯玉祥为代表的一派，力主进军东北，以武力解决东北。《民国日报》一九二八年七月有一则消息为证：“冯玉祥、魏益三等力主此际以武力彻底解决东三省，恐留将来祸根，彼等对奉意见、极为强硬。”<sup>①</sup>从后来一系列事件看出，这一消息表明冯玉祥等将领反对与东北妥协的事确为事实。<sup>②</sup>身为北伐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手中握有最雄厚实力并与张作霖曾有刀戈之仇的冯玉祥主张武力对付奉军，这对奉军来说，不能不有所余悸。而此时奉军恰遇统帅张作霖新丧，<sup>③</sup>军心始动。初为奉军新统帅的张学良，面对此种局势，当然是甘愿与北伐军议和。这是原

因之一。

## （二）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

张作霖皇姑屯身亡后，奉军失去重心。如果张作霖在世时，尚能以其君主式的权威驾驭军中各派，使奉军内部矛盾只能掩蔽式的发展，那么，张作霖死后各派为争权夺利，原有的矛盾则趋于明朗化。在奉军中，张作霖死后，则明显分为三个派系，这就是张学良的太子派，张作相的绿林派和杨宇霆的士官派。

张作相与张作霖同出于绿林，以其资望，足以成为张作霖死后奉系的中心。但由于他受封建伦理道德束缚至深，加之受张作霖托孤之嘱，因此尽管与张学良存有种种矛盾，但仍与太子派能统一行径。

杨宇霆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张作霖对他极端宠任，倚之如左右手，东北军政，凭他作主，他也以诸葛自命，骄纵姿睢，不可一世”。<sup>④</sup>张学良对杨宇霆在奉军的行为早已不快。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反而比张作霖在世时更显得目中无人……对张学良俨然以监护人自居，不在他自己职责范围的事，也强作主张”。<sup>⑤</sup>杨宇霆公开的说：“关外的事我杨宇霆可以作主”。<sup>⑥</sup>

因此，奉军中派系的斗争，实际集中于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正是张杨之间尖锐的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复杂情况，促使了张学良愿改旗易帜与南京政府妥协。

由于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影响，在张杨

矛盾的冲突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双方的矛盾并不是相向冲突，而是同向竞争。

当时的中国，被长年不断的军阀战争拖得疲惫不堪，全国人民“希望统一，异常迫切”。尽管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统一”是一种变性的了的名词，但人民苦于分裂的日子太久了，因此在南京政府的“统一”声中还是投了一票。统一是时代的潮流，这种历史的潮流决定谁能顺应之，谁就能为民众所拥护。

张学良和杨宇霆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促使张学良下易帜决心的并不是杨宇霆的亲日反统一活动，而是杨宇霆较积极的亲蒋“统一”活动。

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率北伐军进军两湖之时，杨宇霆就声称：“蒋介石若对于共产党加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并且说“南北两方并无感情之冲突……政见相同之处甚多，确有可能合作。”<sup>⑦</sup>

一九二八年六月张作霖死后，杨宇霆即派张宣与南京政府联络，要求加入南京政府，实行南北统一。<sup>⑧</sup>

当时的报刊也有这样的报道：“杨如上台，妥协不成问题，东省必能改制易帜。”<sup>⑨</sup>

鉴于杨宇霆的这些言行和当时舆论的宣传，张学良意识到，只有从速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主张，方能增强自己与杨宇霆斗争的力量，也才能稳住东北社会的舆论和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这个态度和主张，唯有抢在杨宇霆之前与南京政府妥协。这是原因之二。

### （三）日本的强凌欺压

如果说，上述两种状况尚有可能逼使张学良投靠一直想独霸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而稳住自己的统治，如那样的话，历史上或许不会出现易帜一事。然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却最终使张学良不得不毅然易帜。决

定张学良舍日“易帜”的是下面三种因素。

1、国仇。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党北伐军势如破竹，奉系军阀统治岌岌可危，眼看中国统一在望，然日本帝国主义竟三次出兵山东，妄图阻挠北伐军北进华北。五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竟又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如果战乱波及满洲，帝国政府为了维护满洲治安，将采取适当有效措施。”<sup>⑩</sup>这无视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的抗日活动方兴未艾，张学良在此种国情中，决不敢轻易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而激怒国人。

2、家恨。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惨案真相已趋明朗，一种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的东方道德观念在张学良胸中耿耿于怀，张学良决不愿忘掉杀父之仇，而去巴结日帝。

3、私怨。日本阴谋立溥仪为东北王的动向，坚定了张学良反日亲蒋的决心。日本政府本想趁张作霖刚死，东北政局混乱之际，实现武装占领的阴谋。未料到东北政局并没有因此而乱，于是日本认为东北问题并未结束，便企图由他们来选择张作霖的继承人。《时事新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之时就报道了日本这种动向，从后来东北伪满洲国的建立来看，此一流传，并非谣传。而这满城风雨的流传，事实上促进了张学良易帜的决心。这国仇家恨私怨使得张学良决心摆脱日帝控制，与南京政府妥协。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说，东北易帜是日帝暴行下的产物，是张学良与日帝之间矛盾的产物。这是促使张学良易帜原因之三。

4、英美势力的潜入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诱和也是张学良易帜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早就对日本企图独霸东北的局面极端不满，早在一九〇六年美国就伙同英国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并警告日本：美国支持日本打败沙俄，为的是打开东北大门，而不是为了

日本的统治去代替俄国的统治。欧战结束后，美日冲突自华盛顿会议后日盛一日。一九二七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后大施赤裸裸的侵华政策，屡次出兵山东，特别是“东方会议”中企图独霸东北以至整个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阴谋披露于世后，美国深感这将严重影响自己的在华利益，为此，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公开声明：中日关于满蒙铁路的谈判不得损害美国利益。

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并未为美国的警告而中止，这严重触犯了美国的在华利权。美国便又伙同英国，一方面资助蒋介石北伐以完成“统一”事业，一方面对张学良则表示全力支持。张学良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明确声称：“英美对我已有所表示”。<sup>①</sup>连一手制造皇姑屯事件的主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在后来谈及张学良“易帜”的原因时也认为：“当时张学良周围的年轻要

人们已醉心于欧美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张学良也把这些入作为谋士加以重用，以致张学良由恐日逐渐变为排日，并终于进而发展到侮日的地步”。<sup>②</sup>

因此我们同样可以说，东北易帜在一定程度上是美日矛盾的反映。

这时的蒋介石，尽管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然实力远不及冯玉祥。为增强自己派系的实力以与其他军阀抗衡，正急待在各方招兵买马。当张学良面临困窘之境正急需援救之际，蒋介石屡派代表到沈阳与张学良秘密接洽，声称“只求张学良改挂国民党的旗帜，以达到国民党在形式上的统一，其他可一概不加过问。”<sup>③</sup>这一许诺对于张学良来说，真是求之不得之事。

正是以上诸种因素，轰动一时的东北易帜才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程序中。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7月11日。

②参见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7月上旬有关报道。

③张作霖于1928年6月3日离开北京退居东北，不意于4日晨途经皇姑屯车站时遭日人所炸而毙命。

④高纪毅：《杨常事件的前因后果》，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

⑤王家楨：《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⑥《北洋军阀史话》台湾版，第646页。

⑦《向导》周报第188期，（1927年2月16日）。

⑧《东北易帜文电辑》，见《研究资料与译文》1983年第一期。

⑨《时事新报》，1928年8月18日。

⑩《日本外文史》，第532页。

⑪《东北易帜文电辑》，转引《研究资料与译文》1983年第一期。

⑫河本大佐：《我杀了张作霖》，见《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

⑬陶隐：《张学良的前半生》。

（责任编辑 翟文奇）